责任编辑:蒋一兵　E-mail:jiangyb@ccps.gov.cn

学术研究中的“同行评审”制度

□陶飞亚

科学研究需要国家资金的资助，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但是为了保证有限的资金不至于打了水漂，在理论上，这种资金显然应该以最公平有效的方式资助最有价值的科学研究。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美国科学界近年关于资助学术研究的“同行评审”和“直接拨款”这两种方法的讨论，可能会给我们一点启发。

学术研究中的同行评审制度最早起源于西方国家。1665年英国皇家学会首创聘请同行，评审投寄给皇家学会《哲学会刊》的文章。美国是第二个采用这种办法的国家。1804年杰弗逊总统要求美国哲学学会在发表路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远征探险的结果之前先进行评审。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1840年美国斯密斯叟尼恩学会（Smithsonian）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对申请联邦科学研究经费的申请者进行评审和推荐。二次大战以后，联邦政府更通过立法，规定对一些申请联邦经费的研究计划或设备计划必须由同行专家进行评审。上个世纪5、60年代专家评审制度在美国被广泛接受并大力推行。从1950年以后美国联邦政府预算通过这种程序资助了大量的科学研究项目。因此，同行评审作为一种美国学术和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已经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的历史、文化和立法中。这种制度也被看成是促成美国研究型大学操持领先世界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同行评审过程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库恩所说的科学团体的某些特征。对学者来说，同行评审不仅是一种外在的分配联邦研究资金的机制，它还深深地植根于高等教育制度之中。同行评审决定了教师取得终身教职资格和晋升和成果价值的评估。在这种机制下，学科新知识、新发现得到同行专家的检验，判断其学术上的真正价值。同行评审还决定了学术研究著作能否得以发表。在某种程度上，同行评审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遵守这项制度被看成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因此，学术界也就是主流学术文化认同这样一个道理，学术机构在作出决定时必须运用同行评审的机制。

同行评审在学术性的科学研究中所起的规范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专门研究同行评审的Daniel Greenberg说：“科学机构怎样来推进真理，消除错误，表扬发现真理的研究者，拒绝胡思乱想呢？”答案就是，科学经过三个半世纪发展，已经进入到证明科学自身是否有所进展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了。谁来作出这种判断呢？通常就是研究者的同行，那些熟悉研究者领域的另一些科学家。Greenberg继续说，同行评审制度并不是绝对不出错的，同行判断的错误也曾发生过。但这种制度要比任何一种其它的鉴定真理的方法，更能够免于诚信问题、欺骗及学派偏见。它也使学术研究和成果评判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免于政治和社会压力的干扰。多年以来，为什么在美国科学界中欺世盗名之事相对少见？美国人认为这并不是因为科学家拥有不同寻常的诚实品质，而是因为科学发现要经过同行专家的严格评审。因此，尽管科学家本人是有感情的，谋求自利的，竭力想超过自己的竞争者，但公正的原则作为他律是一种强有力的规范。科学工作者如果要在专业上得到酬报，自己的发现必须经过同行专家评审。美国前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Atkinson曾说：“美国科学已经在国际性科学奖项中占支配地位，它所带来的科技革命影响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美国科学制度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同行评审。”

但是这种制度在美国学界也经常受到批评。美国学者认为同行评审看上去是个好机制，但实际上是有缺点和带倾向性的。第一，由于现代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专家除了自己的专门领域之外，对自己专门研究之外的领域实际上所知有限，特别对一些超出自己知识结构的创新性研究的判断难免失准。第二，同行评审在本质上是有倾向性的。在美国各个领域的评审小组大多数成员来自美国排行前10名或20名的一些长春藤大学。他们被批评把联邦政府的研究经费用来酬报他们的同事。还有人认为同行评审是一个老同学、老朋友的网络，它使富人变得更富。多年以来，这种制度一直在资助同一类的老学校、同一类的老科学家和同一类的老学科，为了资助一些有特权的少数人，而否定了资助一些新人的创新研究计划。一些批评还指出长春藤大学并不是样样领先，像高温超导这样的发现就是由不太有名的休斯顿大学和阿拉巴马大学，而不是哈佛所发现的。

因此，一些在同行评审制度中居于劣势的大学校长，为了给自己的学校争取机会，转而呼吁和游说华盛顿的国会议员为那些正在成长的大学提供直接拨款，从而使它们壮大到足以去争取同行评审的资助。而国会议员则从自己所在州的利益和竞选连任的动机，也帮助一些大学得到科研项目和设备项目的直接拨款。自1980到1996年中，这种国会直接拨款数达52亿多美元。但这种直接拨款或者“政治拨款”，受到美国主流学术界和全美大学协会的批评，认为这种资助制度绕过同行评议，转而依赖政治影响和直接拨款，使它的科学价值打了折扣。因为这些拨款计划几乎不就它们的科学质量而受到审查。同时也减少了本来用于通过同行评审资助科学研究的资金。美国前总统里根、布什和克林顿为削减联邦赤字都反对这种直接拨款，并多次否决了一些拨款项目，但总统在财政拨款上的有限权力也不能限制这种做法继续付诸实施。

不过，在目前美国科学制度中，同行评审在国家资助科学研究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直接拨款作为一种补充也依然存在。有关这两者的争论也仍在国会和学术界进行。显然，这两者作为科学资助制度都有其合理方面。这或许对我国的科学资助制度也会有所启发。

严复与北大

□吕品

谈起严复，就不能不说到北京大学。严复和这所名校可谓有着不解之缘。其因缘关系，可溯至大学的初创年代。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是光绪皇帝“废八股、兴西学”的重要举措之一。而在此一年前，严复出于对维新新政事业的热心，大力协助友人张元济在京师设立通艺学堂，不仅为学堂命名，还积极为学堂引荐师资，他的侄儿严若潜是该学堂的常驻教员，他自己也在学堂作“西学门径功用”的专题讲座。百日维新失败后，张元济被革职离京，通艺学堂被并入新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02年，应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之邀，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1912年，严复被正式任命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接管大学堂事务。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自然而然就成为北京大学历史上第一位校长。虽然严复真正掌管北大的时间很短，仅8个月之久，但在北大的百年史中，这几个月的意义却事关生死存亡甚为关键，严复为北大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严复刚接手京师大学堂时，正处在清政府统治危机的浪尖上：校舍先被义和团改为神坛，后为八国联军占领，学校关闭，师生流离，图书仪器荡然无存，存款仅有万金，处境艰难，大学堂名存实瘫。严复曾在家书中说：“大学堂每月至省须二万金，即不开学，亦须万五。刻存款用罄，度支部、学部一文不给，岂能为无米之炊？”无奈此时民国政府新立，国库一贫如洗，严复尽所能自筹，从华俄道胜银行，借得7万两款项。

可是这7万两仅仅是杯水车薪。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袁世凯加紧搜刮民脂民膏，缩减其他部委经费，全力支持其军队建设，扩大其亲信部队的力量，以此来巩固他并不牢靠的统治基础。因此，教育经费成了第一个牺牲品。1912年6月，财务部发布通令，宣布京外各衙门及学校职教员月薪在六十以下者，一律照旧支付，而在六十元上者，一律暂支六十元。这一通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北京大学已有数月领不到经费，办学情况岌岌可危。

除去缺少办学经费外，由于民国初期的政治派别斗争异常纷乱，接着便是有人在报纸上造谣攻击，再加各种运动差事，严复感到难以自全，“极难对付”。他一方面采取了归并科目，精简机构等措施来缩减开支，并通过再次借款，来保证日常的教学工作，另一方面，他上书议会，反对财务部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紧缩办学经费。他提议，“为今之际，除校长一人准月支六十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职教各员，在事一日，应准照额全支。”

孰料，7月7日，教育部下达结束北京大学的命令，称“大学校自开办至清末，凡历十余载。中间更经丧乱，因陋敷陈”“学生之班次虽增，陶植之成绩未著”，“政体既变，各方对大学咸有不满之意”。同时，教育部还颁行“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决定学生提前毕业，不授予学位，一律不招新生。

教育事关国运,不可不办。在英国留学的数年，严复已经认识到，欧洲坚船利炮背后，是一整套完善的社会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契约，保护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社会其他各项事业，使之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而教育，正是为了服务于社会，为了传递有效信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为了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更为先进的社会文化。

严复写下《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直呈当局并向社会吁请支持北京大学办学。他认为：北京大学自创办以来，集中了当时的最好人才与最大物力，经过十年的艰苦经营，才获得了全国最高学府的地位。“一旦轻心调之，前此所糜百万帑金，悉同虚掷，十分可惜”，办大学既为造就人才，也为“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至于办学程度的问题，世界上文明国家各有著名大学十几所，乃至几十所，我国仅此一所尚不克保存，岂不令人痛心！而北大设立的各种学科，“是则为吾国保存新旧诸学者起见”“既有造就之盛心，必不患无学者”。与此同时，严复还写了《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呈给教育部，详细阐明创办新式北京大学的指导思想与改革措施，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思想，要使北京大学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

严复为寻求北大生存与发展所作努力，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师生的同情与支持。北大文、法、工、农四科的学生代表，联名提出说帖或请愿书，抗议停办北京大学，支持严复意见，有的甚至提出北大脱离教育部自行办学的意见。在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下，7月10日，由蔡元培主持“全国临时教育会”撤销了拟将北京大学停办的原决议，并参照严复的意见，提出九条解决办法。为了解决财政的困窘局面，严复又一次为筹款奔波，终于从华北银行借得20万两银子，使北大再次渡过难关。由于严复的学问和声望在海内外有相当影响，同年7月29日，英国教育会议宣布承认北京大学及其附设的译学馆均为大学；伦敦大学也宣布承认北京大学的学历。北大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由此奠定。

在严复的主持和领导下，北大的办学和改革一时颇有起色。然而，因为派系斗争等种种原因，严复于1912年10月，被迫辞去北大校长之职，离开了北京。在同年11月严复为预科学生所撰写的《大学预科<同学录>序》中，似乎可以看出严复当时的无奈心情：“天下之理，非年时之学所能尽；一国之事，非一哄之众可得专也，敬告吾党慎之而已。”

从北京大学卸任后的严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转向了政治舞台。民国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总统府外交顾问。似乎与中国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为、林纾等一样，严复晚年的思想趋于保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保守派。而他遗言的第一条也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但是他的爱国之情和忧患意识始终未变。1916年严复写给好友熊纯如的信中提及了这种感情：此番英使朱尔典返国，仆往送之，与为半日晤谈，抚今感昔，不觉老泪如绠，朱见慰曰：“严君，中国四千余年蒂固根深之教化，不至归于无效，未必非所以玉成也，君其勿悲。”复闻其言，稍为破涕也。

解读族群（二）

□刘泓

族性——一个与族群相生相随的话题

族性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汇。它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接着70年代在欧洲流行起来。

1953年版的《牛津英文字典》首次记录了这一词汇。它的意义相当不确定，可指“某个族群的本质”　或者“属于某个族类共同体或集团的特性”。换言之，“如果你们是某个族群的成员，那么相对于其他族群成员而言所共有的”（品性）即为所谓“族性”。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当人们需要辨识“我一他”间的差异时，它可以用来表述不同的民族类别和两个人们共同体间的相互关系。

英文名词“族性”是比较古老、通俗的形容词“族裔的、民族的（种族的）”派生物。这个英文形容词的出现可追溯至中世纪。它源于希腊文“族裔”，当时基督教会将之作为“异教徒”的同义语，指既不皈依基督教，也不信奉犹太教的“异端分子”。“族裔”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使用范围较为广泛。比如在《荷马史诗》中，它与“朋友”、“部落”、“蜜蜂”或者“飞鸟”这类词汇相连，具有“量词”的意义，也有表明所陈述对象“族类归属”的作用。古希腊诗人、学者在指称波斯人、提到某个种族的男性或女性、表述旧时传令官员的种姓时，都曾使用了这一词汇。不难看到，古希腊人对“族裔”的诸种用法包含着一个共同理念，即含指具有共同文化或生物特征的人群或动物群体。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用法中所涉及到的“人”是“另外一些人”，他们是“像动物一样的”、“非我族类”的人。在古希腊人眼中，“边缘人”（非希腊人）、“国外的野蛮人　是具有“族性”的“另类”　他们自己是“非族类性的”“文明人”。

族性一词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欧洲社会。当时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领导人正在为移民问题伤脑筋。因为西欧国家在战后从土耳其、北非等地招募了很多外籍工人，这部分人大多愿意在欧洲定居而不希望重返故土，由此给政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核心是如何对大批移民实现整和。于是，研究美国在处理移民问题方面的经验，为本国政府提供可借鉴意见，成为欧洲社会科学家们的工作重点。“族性”一词在这个过程中被从美国的有关文献中直接搬用到欧洲的出版物上。

这个概念的关键特征是对某一种群体或者人们类别作或隐或显的对比。在使用族性这一概念时，总会牵涉到“我们-他们”这对“标准”，以表述不同的民族类别和两个人们共同体间的相互关系。人们研究族性的目的是为了弄清可以标示和对比某一群体存在的基础及其发展变化。

族性具有动态性和多层次性。它有时可以被理解为民族性，有时应该从“群体认同”、“我群意识”、“群体意识同一性”等方面来理解其内涵。举一个例子可能会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理解。以我国宁夏回族为例，他们在外国人面前认同于中国人，在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面前认同于穆斯林，在维吾尔等其他中国少数民族穆斯林面前认同于回族，在青海回族人面前认同于宁夏的回族人。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族性”具有的“动感”和“层次感”。实际上，人们已经从不同角度使用这一概念，　比如历史、文化群体（部落、民族、移民、难民、外籍工人等）方面，　国家意识形态基础方面，文明、文化同质性方面等等。

一般说来，族群成员个体言行所体现的“族性”　难以脱离本族的共性及其演进轨迹而存在。抛开组成族群的个体谈“族性”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世界许多地方都生活着那些散居在国外的族群，比如亚美尼亚人、希腊人、犹太人和海外华人，他们的命运可以清楚地为这一观点提供实证。屡见不鲜的是，海外游子们往往会脱离其所属的族群，被其居住地的主流社会所同化。

族裔认同——一个逐步升级的话题

“族裔认同”是指族群内部成员个体对集团共性的识别，是归属于某独特文化集团的个人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内容包括从祖辈处传承下来的对祖先及其出生地的认知，对自己所属族群或文化怀有的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为保护和发展本族利益对外来的敌对分子和入侵者所持有的斗争意识，等等。

随着人类族际交往的日益频繁，人们的视野在不断扩大，跨文化现象与日俱增，族裔认同的层次和范围在逐步升级和扩大。从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到民族、国家、区域联盟，人们的族裔认同类别越来越丰富和多重化。在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的当今世界，族裔认同的升级、认同范围的扩大、认同类别的多样化和多重化必将得到更加有力的推动，这也再一次清楚地表明人类正在走向成熟。欧盟东扩的步伐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曾经率先创建民族国家的西欧诸民族，现在正首当其冲地冲破“民族”堡垒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制约，通过让渡民族国家主权建立超国家的区域性联盟。

在人类社会成员对族裔认同的不断升级中，人们的民族观念、民族意识也必将经历一个从萌芽、强化、在部分群体中发展到极端，到人为地弱化、理性地弱化，直至演生出更合人性的新的观念，人类共同利益和高度的人类文明得到全体人类的认同。这是一个“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人类民族过程的自身发展规律、社会进程发展规律及其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关注人类民族过程的概念、术语以及相关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理解不同类型的国家在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实践上的得失，珍视我国目前各民族和睦共处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为世界和平与进步做出我们的贡献。

（全文完）



■文化产业

文化与经济交融

□傅守祥

“文化产业”最初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霍克海姆在1947年出版的二人合著《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部分经济学家开展了跨学科的研究，对经济与文化间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探讨，阐释了“文化”成为“产业”的可能空间和发展特点。1990年，以时代华纳合并为标志，美国开始实施对各类传媒的“非管制化”政策，使得像时代华纳这样的特大型文化产业组织出现了大规模的合并趋势，进而开始全面进军国际文化市场，这就使以法国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在文化上感到了威胁，从而提出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来应对挑战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由此一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之一，并向世界各国展示了它广阔的发展空间。1999年10月的意大利佛罗伦萨会议上，世界银行提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将是世界经济运作方式与条件的重要因素。这标志着经济与文化在不断接近以后开始走向融合甚至重合，一种新的经济类型或者经济发展模式——“文化经济”诞生了。在世纪之交，为知识经济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非物质的、符号的交换与消费已经成为超越民族国家的典型的增长领域，文化竞争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领域，特别是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各地区都已经把文化发展战略变成了一种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主干之一，文化产业的发展迅速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尤其是在那些已经决心加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来的国家。因此，可以说发展文化产业，有意识地采取相应政策，使得文化发展与国家经济建设同步，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大势。

“十六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性或者说是带发展趋势性的重要现象。当代经济也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经济和文化越来越密不可分，它们不断接近以至融合甚至部分重合，其突出表现是：物质产品中文化内容的价值比重迅速增长，许多消费品需要附着一定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品位；而文化也通过批量复制的方式通过市场大规模传播。正是在这种经济与文化的一体化过程中，文化产业日趋兴盛起来。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抓文化也就是抓经济，甚至是更好地抓经济，国际经济学界就把新世纪的知识经济称之为“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应该是一种“人文化的知识经济”，即一种“在世性与神性追求双赢”的知识经济，这种双赢首先是：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同时，突出物质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特点、提高物质产品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含量；其次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关怀，反对因发展经济而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反对掠夺性开发、提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三是：强调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分量和本土文化特色，提倡保持文化的生态平衡，反对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损害文化的保存和发展，防范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短视行为和负面效应。“在世性与神性追求的双赢”，其主旨在于破除物质与精神的隔膜、协调现世与未来的关系、平衡人类行为与自然演化的冲突，走出经济或物质中心主义，最终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与人类精神不断升华之间的和谐共存。因此，我们应该将文化积淀与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富有商业价值的文化精品，把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使文化事业的发展融入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光大银行成都分行
向四川省部分党政领导干部
赠送2004年《学习时报》